

· 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

学术主持人: 王宁

主持人语: 在中国,不但自然科学是舶来品,社会学也是舶来品。作为舶来品,中国的社会学必然经历一个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消化和吸收的过程。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学术依附现象,即发展中国家在学术上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但这种学术依附在初期阶段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它也让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人类知识的核心区。但是,向西方学习往往带来两种意想不到的后果。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就是向任何拥有科学知识的拥有者学习,不论他是谁,也不论他是东方还是西方、南方还是北方。在这里,重要的是知识以及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不论“谁”拥有它。如同我们去市场上买东西,我们要买的是最好的东西或性价比最高的东西,而不论卖主是谁。当然,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可能有些人只学了皮毛,并没有真正学习到西方知识的科学内核(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这导致他们在面对西方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特殊现实时,依然采取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办法。这种现象就是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食洋不化”。它属于没学好,学习者是不合格的学生。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吁,是有学理依据的。另一方面,“向西方学习”指的是学术落后国不得不向学术发达国请教、不得不依附于学术发达国的事实。它很容易引发学术依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弹。随着学术依附国的国力逐渐强盛,必然要求摆脱这种学术依附地位。这种出于民族主义情绪所倡导的本土化议程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摆脱学术依附地位?仅凭“学术自觉”能解决这个问题吗?社会学要不要本土化,这其实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它如何本土化。这又回到了知识生产的内核:科学的、有效度的知识生产是如何可能的?我们如何才能具备生产科学知识的能力?只要具备了这种能力,社会学本土化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已经相当本土化了。因此,社会学本土化问题所掩盖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实是:如何才能生产出科学的、有效度的社会科学知识?我们如何才能具备生产科学的、有效度的知识的能力?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应该上升到这个层次。本专栏的三篇文章,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三位作者的一个共同观点是“本土化”指的是知识必须具有有效度,能够有效解释现实,符合实际情况。这种意义上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不但不对立,而且,它反而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工作走向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 再论作为学术运动的社会学本土化

刘能 吴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把中国社会学学科史分解为社会学思想传入和翻译阶段(1895—1920)、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1921—1952)、社会学恢复阶段(1979—1998)和社会学常规化阶段(1999—2018)四个内部分期,并对这四个时段内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源起和表现特征做了初步阐释,认为外部学术要素卷入(或中外学术态势对比)、内生学术结构特征的变动和技术及其他支持体系的约束(或促进)构成了理解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之兴起和形塑的知识社会学框架的三大核心要件。文章继而就当代社会学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争议中我们认为较为中肯的几个代表

**[主持人简介]** 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刘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吴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性意见进行了特别回顾。最后,文章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演进的宏大脉络中,本土化和国际化/全球化之争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相关性,而毋宁说其表征的是学者们在各自学力养成基础上的一个“价值有涉”的立场和偏好而已。因此,无论是在研究议题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一个兼容并包的学术原则将或者调和持不同立场者间的争端,或者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走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关键词]社会学本土化;知识社会学;时空嵌入性;理论抽象程度;方法竞争“价值有涉”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9)01-0005-12

## 前言

1988年,笔者(第一作者)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正式开始了社会学生涯。大三时教授《国外社会学理论》的是李文老师,教材是由他自己主编的两大本厚厚的油印本。当时其他社会学理论的参考教材也并不多。印象之中,华夏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过一个包括各社会科学学科译著在内的《二十世纪文库》,社会学的是绿色封皮的,哲学的好像是橙色封皮的,历史学的是红色封皮的。在这个绿色的社会学系列里,彼得·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与交换》<sup>①</sup>名列其中。还有一本名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小书<sup>②</sup>(前几天去系图书馆找这本书的时候,发现译者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孙立平教授。结合注释<sup>①</sup>来看,当时的青年社会学教学力量,大多都加入了西方社会学名著的译介过程之中,并成为其中的核心力量),介绍了包括 Amitai Etzioni、Gerald Lenski 和 Peter Berger 在内的小众社会学理论家。浙江人民出版社也曾非常积极地加入社会学理论的译介,比如乔纳森·特纳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sup>③</sup>一书,最先是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1986年翻译过来的。另一本传奇式的著作,便是贾春增老师编的《外国社会学史》<sup>④</sup>,也是笔者(第一作者)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参考较多的备考材料。可以说,整个1980年代,重新恢复的中国社会学是在翻译介绍西方纲领性教材<sup>⑤</sup>的同时亦步亦趋前行的。

到了1990年代中期,随着整个社会学界教学和科研事业的逐渐进步,青年学者们的专业自信心逐渐提升。大概有两个很微小的事例可以在这里提出来作为注解。这个时期,恰好是电脑排版文本替代手抄稿件的时期,因此,这个小小的技术进步使得社会学界在基本科研的形式化能力上,出现了周晓虹教授所指出的“文化反哺”现象<sup>⑥</sup>。另一个则是哈佛注释体系的引入,即出于阅读习惯和引用效率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年轻社会学人开始以西方社会学主流英文期刊流行的“剖腹注”代替原来的页下注。引用体例的这一规范化进程虽然细微,却也是形成中的学术共同体之伦理偏好发生转型的一个表征。总之,这两个小型事例可以用来展示,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学术规范领域的小范围共识达成,社会学学术共同体内部一致行动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之所以提起这些往事,实际上是想说明,当代学者们在论及社会学本土化和国际化之争时,不外乎都是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学术生涯的角度出发,来对这一议题发表各自意见的。因此,从知识社

①[美]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与交换》,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译者为笔者(第一作者)在南开社会学系读书时的授课教师孙非教授,后来他调离社会学系到了南开的政治学系。

②[美]玛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③[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⑤社会学概论方面的早期译著,至少包含了美国社会学家 David Popenoe 的《社会学》(波普诺,1987);而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教材,则还有加拿大社会学家 Kenneth D. Bailey 的《现代社会研究方法》(Bailey,1982),中译本由许真翻译,于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会学的视角来看,嵌入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学者们的主观感受应该得到重视。另一方面,这些亲身经历,也使得学者们将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吁看作是一场学术运动的提法<sup>①</sup>有了经验的基础。学界关于社会运动的定义<sup>②</sup>,实际上不外乎如下三个关键要素:一个是将其看成是集体性的、一致的行动;一个是认为其本质上是体现发起者和参与者之社会变迁偏好的行动;另一个要素,正如芝加哥学派学理脉络下衍生的“突生规范/emergent norm”理论<sup>③</sup>所演示的那样,强调的是新的规范与之前社会共识的偏离和突破。因此,我们接下来的文字的主旨,就是以社会学学科自十九世纪末引入中国社会以来的学科史为背景,论述贯穿于这一时间线当中的种种社会学本土化努力,将其看作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运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学术史的这一回顾,使得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时空嵌入性”这一概念的强大穿透力,透视本土化议题背后的非学术性动机(extra-academic motives)和主观体验所扮演的角色。

## 一、学科时序视野下的社会学本土化

由此可见,在我们眼里,社会学本土化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议题,更是一场“学术运动”,是学术全球化过程中,边缘地区的地方性学术共同体处理学科发展问题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本文将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遭到取缔后重新恢复和制度化的过程,分为社会学思想翻译与传入阶段(1895—1920)、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1920—1952)、社会学恢复阶段(1979—1998)和社会学常规化阶段(1999—2018)四个不同阶段,尝试对各个阶段中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缘起和具体表现一一加以说明。

### (一) 社会学思想翻译与传入阶段(1895—1920)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国内丛生的社会问题不断加剧着社会矛盾。面对国家危难,一批仁人志士致力于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与思想观念,希望用西学改造国家和社会。社会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介绍到中国的。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并将sociology翻译为“群学”<sup>④</sup>。三年后,曾广铨翻译、章太炎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开始在上海《昌言报》连载。20世纪初,章太炎和严复又先后于1902年和1903年分别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此外,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学者也在各自的著述中提到了“群学”或“社会学”的概念<sup>⑤</sup>。

这一阶段的本土化实践,主要体现为一种基于东西方对话的无意识的“话语本土化”过程。首先,作为一个“舶来品”,社会学被引入中国时面临着理论的情境转换与情境适切性问题。在西方,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被提出是为了回应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危机。虽然当时中国与西方的社会背景差异很大,但是社会学思想被学者引进国内,事实上也是为了应对工业化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

<sup>①</sup> 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及其目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陆远《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早期尝试——基于〈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界〉〈社会学刊〉等杂志的探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吴晓黎《印度社会学本土化实践中的理论化探索》,《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3期。

<sup>②</sup> Blumer, Herbert. “Collective Behavior.” In Robert E. Park ed. An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39; Zurcher, Louis A., and David A. Snow.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al Movements”. Chap. 15 in Morris Rosenberg and Ralph Turner eds.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Giddens, Anthony. Sociology. London: Polity. 1997.

<sup>③</sup> Turner, Ralph, and Lewis Killian. Collective Behavior. 3rd Edition. Pearson College. 1987.

<sup>④</sup> 严复《原强》,载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sup>⑤</sup>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中国社会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危机<sup>①</sup>。严复早年公派留英学习船政,但回国后,他习得的西洋技术没有受到重视。甲午战败深深刺痛了他,他开始积极地发表文章介绍西学,并发表关于社会变革的主张<sup>②</sup>。与早年就接触西洋技术的严复不同,章太炎早年师从俞樾刻苦研读经学,但是狂暴袭来的“欧风美雨”刺激他关心国事,留心时务。面对社会危难,章太炎不愿再做“法先王”的“孟子之徒”,转而选择“应时代要求,把传统的和外来的思想兼收并蓄,改造制作,为革命提供思想武器”<sup>③</sup>。虽然中国的现代性表现为一种“被动的”、作为“他者”的现代性,但这种时代背景的契合性,为社会学思想可以被跨情境理解奠定了基础,也为社会学知识与实践的本土化创造了可能性。

其次,为了能让中国读者理解西方的思想,学者在译介过程中必须与中国传统思想家进行类比。这不失为一种最早的“本土化”策略。例如严复在解释“群学”时,引用了荀子的思想:“‘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sup>④</sup>取以名其学焉”<sup>⑤</sup>。同时,翻译和诠释的过程,也是译者自己思想传达的过程。不同的用词,不同的释义,反映了学者之间的不同取向。同样选择“群学”这一语词,康梁所倡导的“群学”侧重“合群立会”之义;而严复对“群学”的理解则被认为更接近西方社会学的原意<sup>⑥</sup>。具体来看,严复将群学视为开启民智最重要的学问,有总揽其他学科的作用。“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未来也”<sup>⑦</sup>。严复构想的现代科学知识谱系是以“群学”为中心,以实证为基本方法的。这个谱系不仅仅是“专门化研究”,而且具有奠定秩序的伦理功能<sup>⑧</sup>。与之相对,章太炎虽然也受到斯宾塞很大影响,但他并不十分赞同社会有机体思想,而是更倾向于吉丁斯的社会心理学与日本学者的社会学思想。比如说,章太炎高度评价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认为“岸本氏之为书,综合故言,尚乎中行,虽异于作者,然其不凝滞于物质,穷极往逝,而将有所见于方来,诚学理交胜者哉!”<sup>⑨</sup>因此,日语的“社会学”三字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章太炎沿用。严复并不反对日译的“社会”一词,但是将它的内涵和外延缩小,以和“群”相区别:“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但是后来,严复慢慢接受了“社会”译法。在学界,“社会学”也逐渐取代“群学”而成为主流翻译用词<sup>⑩</sup>。

## (二) 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1920—1952)

20世纪初期,中国开始建立近代高等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在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知识传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最早的社会学专业基本上都由教会大学开办,比如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浸礼会学院及神学院(沪江大学)。后来闻名遐迩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是传教士步济时创立的。传教士与教会创办的社会学专业并没有停留在理论思辨上,而是积极开展社会调查,进行社会服务。例如步济时领导的对北京市人力车夫的调查、狄特莫对北京百姓生活的调查、基督青年会带领学生参与社会服务等<sup>⑪</sup>。这些早期的社会调查与社会服务,客观上为中国培训了人才,且这

① 比如金耀基先生也曾指出,社会学的兴起是对现代社会之出现的一种回应(参见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②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中国社会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③ 林闽钢、李保军《章太炎与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④ 锡彭塞即斯宾塞另一译名。

⑤ 严复《原强》,载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页。

⑥ 张超《从“群学”到“社会学”:近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形成与演变》,《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12年第1期。

⑦ 参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

⑧ 应星、吴飞、赵晓力等《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⑨ 参见姜玠《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⑩ 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5)》,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9页。

⑪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中国社会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9页。

种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风气也为社会学真正扎根本土奠定了基础。但在实地调查中,学生们也逐渐发现在中国严格运用西方调查方法的困难。比如当时中国平民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对数字也没有概念。同时,这个时期的调查对象范围较为局限,资料可能带有偏见;研究者由于不了解中国社会,分析上难免会有错误;调查成果也大多用外语发表,未能在国内造成广泛影响<sup>①</sup>。这些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研究与中国的社会情境是脱嵌的,国内的社会学尚没有摆脱依附而形成主体性。

另一方面,世纪之初,一大批中国学子自费或被资助去西方留学,他们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系统学习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20年代他们先后回国,大部分进入大学的教研机构工作,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社会学家。他们在留学时深刻意识到中国的孱弱,致力于用学术研究改造和振兴祖国,改变祖国的殖民地位<sup>②</sup>。同时,他们发现当时国内教学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套用西方教材、讲述西方案例,脱离中国现实的情况<sup>③</sup>。国家政治与学术研究对西方的依附刺痛了他们。1925年,许世廉先生在《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这篇文章从当时中国社会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着手分析,倡导建设“本国社会学”<sup>④</sup>。以此为契机,“社会学中国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次运动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第一次集体性的、有意识的本土化实践,它意味着在经验调查、理论探索、知识应用与学科建设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本土化。

对于民国时期社会学者的群像,学界有不同的刻画方式。比如根据他们的学术实践分为社会调查派、乡村建设派、人口学派、社会心理学派等<sup>⑤</sup>;又或根据研究取向分为文化学派与社区学派,或根据活跃程度区位分为中央学派与燕京学派等<sup>⑥</sup>。目前,在社会学史的梳理与讨论中,比较公认的是将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学派/社区学派/燕京学派,与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文化学派/中央学派相区分,以考察当时社会学者在学术研究与本土化实践方面的不同取向。

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文化学派/中央学派<sup>⑦</sup>的本土化实践,主要反映了一种学院社会学的志趣,其主要目标是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孙本文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采取欧美社会学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的过程<sup>⑧</sup>。周晓虹认为,孙本文所界定的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欧美社会学家的理论+中国固有的社会资料<sup>⑨</sup>。这种中国化的努力可以归入费孝通后来所批评的“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旧模式<sup>⑩</sup>。

相比之下,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学派/社区学派/燕京学派更重视通过社会调查与社会实验来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吴文藻认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

①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中国社会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② 徐平《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吴文藻》,《群言》2017年第6期。

③ 参见徐平《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吴文藻》,《群言》2017年第6期;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研究》2012年第1期;文军、王琰《论孙本文与社会学的中国化》,《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④ 文军、王琰《论孙本文与社会学的中国化》,《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⑤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中国社会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 陆远《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早期尝试——基于〈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界〉〈社会学刊〉等杂志的探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⑦ 学界一般认为这一学派的学者主要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工作,除了孙本文还包括朱亦松、柯象峰、龙冠海等学者。

⑧ 孙本文《中国社会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载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8-19页。

⑨ 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研究》2012年第1期。

⑩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的长成》,载《费孝通文集》(第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页。

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本土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sup>①</sup>。由此可以看出,吴文藻对西方理论的态度既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盲目摒弃,而是谨慎地将其作为试用假设,并格外强调通过实地调查“证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实证取向。当时燕京大学的其他学者也都非常看重社会调查。陶孟和曾感慨“中国的历史没有一部描写人民的历史”,李景汉认为只有通过社会调查才能换来事实,才能真正解决问题<sup>②</sup>。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燕京学派的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影响的社会调查与社会试验,例如陶孟和对北平生活费用的调研,李景汉开展的北京洋车夫调查与定县调查,杨开道开展的清河实验等。这些扎根本土的研究实践对于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抗日战争期间,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并未中断。由吴文藻、费孝通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陈达、李景汉等人负责的西南联大国情普查所以及以陶云逵为代表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在云南继续着边疆地区社区调查和人口调查的努力<sup>③</sup>。

### (三) 社会学恢复阶段(1979—1998)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1952年学科调整以来二十多年的学科沉寂,社会学进入恢复重建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议题再次被学界热议。这个阶段大致包括两个各自独立开展又相互影响的过程:一是港台地区面向学术全球化的本土化运动;二是大陆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中的本土化倡议。港台地区的学术本土化运动主要由港台一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发起,包括金耀基、杨国枢、黄光国、叶启政等,以1980年在台湾举行的“社会与行为科学的中国化”讨论会、1983年在香港召开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讨论会等研讨会为标志。本土化讨论之所以在港台地区再次兴起,首先是因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学专业在台湾、香港地区培养的第一代年轻学者学成归来后,困惑于西方的学术传统与中国现实情境的差异<sup>④</sup>。其次,虽然当时台湾、香港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但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没有改变,欧美的主导地位使得港台的学术和文化也沦为附庸,这使得港台学者将本土化视为一种获得学术自主性和文化独立地位的努力。例如杨国枢认为“40多年来台湾的心理学一直是美国心理学的附庸,缺乏应有的自发性与独创性。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拿掉西方心理学(特别是美国心理学)及模仿西方心理学所获得的一点研究成果,我们几乎就一无所有”<sup>⑤</sup>。金耀基先生则主张应当在全球体系中重新定位中国文明,在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sup>⑥</sup>。

港台地区开展本土化讨论的时候,也是大陆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的时候。这一时期大陆社会学的本土化反思,既受到港台讨论的影响,又是民国社会学者精神的延续与学科重建这一任务的内生需求。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开启了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进程。由于长时期的停顿,与国际学界多年没有交往,学科重建的第一步就是要再次向西方学习。当时费孝通先生牵头在南开大学组织的专业班,邀请了林南、布劳等国外著名学者讲学,积极吸收西方前沿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补课”过程中,国内社会学界出现了简单移植西方理论进行研究、生搬硬套西方观点、忽视中国特殊性以及理论抽象化能力不足等现象<sup>⑦</sup>。因此,社会学本土化就成为恢复

①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载《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5页。

②参见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中国社会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2页。

③杨海挺、石敏《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呈贡县的“魁阁”与“文庙”: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两大学派》,《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④林南《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

⑤参见李桦《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华人心理学——访台湾大学杨国枢教授》,《开放时代》,1996年第3期。

⑥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⑦林南《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

重建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原则。李强教授曾经如此批判当时生搬硬套的风气“有些论文、著作将舶来的一些概念和理论硬往中国的社会现象上套,试图削足适履,结果除了玩弄一些辞藻、搞一些文字游戏,对于实际社会问题的阐释、理解、应对均没有什么贡献”<sup>①</sup>。1988年在纪念吴景超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上,费孝通先生强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乡土同当代国际相结合,这样逐步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学的一批概念”<sup>②</sup>。雷洁琼先生也认为应该使社会学为国家服务,而不是照抄欧美的理论<sup>③</sup>。

#### (四) 迈入常规化阶段(1999—2018)后的争论

2000年前后,经过几十年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进入常规化阶段。社会学的研究议题深入到各个领域,并且出现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成果。但是打开中国知网检索就会发现,2000年后国内学界关于“本土化”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甚至近年来又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周晓虹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非但没有彻底解决,而且因为现在越来越迅疾的全球化的到来而显得愈加突出。……今天大规模的留学潮和出国热,以及更大规模的西方思想和学术的即时引进、过度进食使得中国人原本就食洋不化的问题更加严重”<sup>④</sup>。

近20年关于本土化的讨论,相较以往,角度更为多元,对话也更为充分。从本土化的取向和路径上划分,大致有如下几种思路:一是强调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实现社会学理论自觉,初步介入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生成空间,如郑杭生将学术话语权视为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深层要求<sup>⑤</sup>;洪大用主张进行话语体系建设进而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的争论<sup>⑥</sup>。二是主张在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与适切性层面上践行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如风笑天主张既要坚守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原则,又要将方法实施适合于具体情境,使其不断完善和发展<sup>⑦</sup>。三是主张回到中国传统思想理论资源去寻找本土化的出路,如应星认为社会学本土化首先要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思想传统<sup>⑧</sup>、渠敬东主张回归经学传统和历史视野,警惕“方法主义”对本土经验的切割<sup>⑨</sup>、周飞舟主张回归中国传统思想实现“文化自觉”等<sup>⑩</sup>。同时,这个时期也出现不少观点反对(过度)本土化。如彭轲认为“本土化”的动机究竟是出于“知识效度”的立场还是“机会主义”的立场是令人怀疑的<sup>⑪</sup>。陈映芳则认为,“本土—外来”这一关系本身并不构成某一门“科学”必须本土化的充足理由,社会科学必须对特殊的经验现象进行抽象才有意义<sup>⑫</sup>。

对于上述争论,也有不少学者持一种折中立场,既反对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也反对过度“本土化”的倾向。如周晓虹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涉及外来知识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本土化

①李强《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及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

②费孝通《代序(1)》,载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③雷洁琼《代序(2)》,载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研究》2012年第1期。

⑤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⑥洪大用《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质与方向》,《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⑦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走向规范化与本土化所面临的任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⑧应星、吴飞、赵晓力等《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思想传统》,《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⑨渠敬东《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

⑩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⑪彭轲《本土化:中国人类学追求新的关联与平等的策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⑫陈映芳《今天我们怎样实践学术本土化——以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应用为例》,《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

并不意味着排斥“全球化”,也不等于传统化。本土化不等于重新向中国的传统复归,或者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全部原料<sup>①</sup>。谢立中则将社会科学本土化划分为四个类型:对象转换型本土化、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理论替代型本土化、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但是他认为这四种类型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本土性视角并非人们理解社会的唯一视角<sup>②</sup>。王宁则将过度西方化与过度本土化分别称为“食洋不化”与“食土不化”。他认为“食洋不化”问题是随意扩大了知识的(跨情境的)外在效度,原因是缺乏知识创新力;而“食土不化”则是借口西方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本土实际,实际是专业水平低,缺乏足够的概念抽象能力和规范的研究技术。他主张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应深入到“知识创新力不足”的制度根源问题。知识创新力不足问题解决了,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sup>③</sup>。

## 二、再论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的社会学本土化： 一个知识社会学的架构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对四个时段中社会学本土化的表现特征做一个简要的总结:(1)在社会学思想翻译和引入阶段,既有严复之类见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之整体社会制度运行效率和优势的有识之士,试图以西学(中的社会科学)来拯救中国危殆的国家命运的企图,又有章太炎之类的国学名士将西学中的社会科学概念和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相对应的企图中所展现的中体西用的思想倾向;(2)在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兴起,已在中国社会浸淫多年的各派教会力量开始兴办大学设立社会学系,将基督教社会改良主义精神,以及社会学学科中更具社会改良精神的学术实践——如社会诊断(社会调查)和社会干预(社会服务)——引入中国;与此同时,一大批留洋回国的年轻社会学者用英语教授社会学各基本课程成为事实。因此,这个时段的社会学本土化意味着至少要用中国语言讲述中国社会事实这样的一个学术意识觉醒和学术范式变迁。(3)在社会学恢复阶段的早期,由于之前学术中断,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外部学术资源的借用成为必然策略,而从学科正当性的角度来看,借由社会学学科和发展理论的切近关系,使得社会学应用于国家发展主义的大局也成为理性的选择。这样就为社会学本土化和全球化/国际化之间的张力做好了铺垫。从当代学者们的主观经验来看,与全球化社会学知识初步接触的个人观感,也会随着学者们自身学力素养的不同(如是否从其他学科转行而来、英文或外文水平如何、数理统计的逻辑是否清晰等等)而有所不同。(4)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学常规化阶段,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深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在过去将近20年间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呼之欲出,这个时候的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从学术以外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转向了如何彻底扭转不均衡的全球学术关系,打造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和话语权的方向;另一方面则对中国社会学过度关注本土的事实提出了批评。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则是对“独特的(idiosyncratic)”中国情境、中国经验(或中国嵌入性)挑战西方社会科学传统假设体系、重构普遍理论的能力的一种呼应。

因此,可以说,在“时空嵌入性”作为一个根本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事实的前提下,无论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学术以外的其他制度性缘由来看,社会科学本土化总是会成为处于高度“时空嵌入性”的非主流学术共同体的主观意识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学术立场。在这里,本文希望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框架,用于对诸如本土化之类的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共识/共

<sup>①</sup>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研究》2012年第1期。

<sup>②</sup>谢立中《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类型——以费孝通先生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sup>③</sup>王宁《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同行动或集体回应的解释。

### 1. 外部学术力量的卷入或中外学术力量对比的均势(不平衡)

在这个知识社会学框架中,外部学术力量的卷入或中外学术力量的相对关系,是第一个需要考察的理论维度。在社会学思想翻译引介阶段,围绕中学和西学相对地位的意识形态争论,以及中西外交和军事上的直接交锋,决定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思想初创时期的第一重不平衡关系,也即西学相对于传统学术体系的优越性。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字运动所代表的激进学术实践而言,这一不均衡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教会力量推动的社会学学科在高等教育体系内的体制化发展,以及当时留洋运动的后果之一——社会科学师资队伍的国际性——都可看作是外部学术力量卷入的直接证据;而中国经验、中国事实和中国社会需求的优先性考虑(如前述燕京学派的学术立场)则是对这一不均衡情形的颇具民族主义气氛的回应。到了社会学恢复阶段,我们看到的是费老自述在接受恢复社会学任务之时,他能动员的人力和学术资源的约束,最后只有找到了自己仍然活跃在国际社会学界的同学(如杨庆堃先生),以及在美国社会学界已经站稳脚跟的华人社会学家(如林南教授等),动员他们的支持。李强教授也指出,在社会学恢复期美国社会学对襁褓中的中国社会学的巨大影响(如布劳、英格尔斯等人在南开大学的早期讲课活动)<sup>①</sup>。这一时期港台地区社会科学家的本土化倡议及其对大陆第一代青年社会学人的持续影响,可以被看作外部学术力量卷入的一个特例。最后,到了社会学常规化阶段,通过千人计划之类的外部人才引进计划,一大批在国外社会学界取得重要学术地位的社会学家(包括但不限于赵鼎新、边燕杰、周雪光、谢宇等学者)纷纷加入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活动之中。他们对国内学术活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以及他们对国内社会学学术活动的评价性意见,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外部学术力量卷入或中外学术关系对比在这一阶段的操作化例证。

### 2. 内部学界结构特征的变动

我们识别出来的第二个知识社会学维度,便是国内社会学界结构特征的变动。抛开第一时段不讲,在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伴随着国立和公立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兴起,教会大学中的社会学从业力量的相对占比大大减少。同时,诸如费孝通、林耀华之类在国内获得社会科学学士甚至硕士后才出境求学的年轻人日益成为普遍趋势。他们带着救国情怀外出求学,同样带着救国情怀学成归国,因此,这一代学者内部学术主体性的习得和加强,成为学界内部结构特征变动的一个主要方向。同样,经过将近20年的学科体制化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地位提升<sup>②</sup>,因而使得学界期望中国社会学获得独立学术地位的预期也渐次高涨(而本土化运动可以看作是这种高涨期望的一种反映)。

在社会学恢复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学学科遭到取消的将近30年时间,使得老一辈社会学者的人力资源和学术资源遭到了无情的抛弃和绝对的浪费。可以说,恢复阶段的第一代社会学学生,都是从其他学科的高年级本科生转来的。这里面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例子,便是南开大学的社会学硕士班(俗称南开班)在整个社会学恢复阶段,甚至在社会学正常化阶段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这个班级走出来的学者,大概覆盖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界重要院系学科领导团队的半数以上。他们成为继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之后,引领中国社会学走向持续专业化道路的第一代继承人。本土学术训练的背景,除了少数例外之外,大概解释了他们在社会学恢复阶段支持社会学本土化的一般立场。到了社会学正常化阶段,我们则在持续的专业化趋势之外,又看到

<sup>①</sup>李强《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及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

<sup>②</sup>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学术地位大致可以从倡导社会学本土化的核心人物之一——吴文藻先生——的相关际遇来加以佐证:吴文藻先生曾经代表燕京大学参加了1936年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并因此与同样参加庆典的英国伦敦政经大学(LSE)的马林诺斯基教授相遇。此次相遇最终影响到当年夏天远渡英伦求学的费孝通先生的导师归属,即从马氏大弟子Raymond Firth那里,转到由马氏亲自指导。

了相对更年轻一代社会学人的成长,从专业训练、文献掌握能力、最新理论跟踪和研究方法更新和学习等多个方面来看,这些年轻学者表现出更加国际化/全球化的倾向。此外,中外学术交流访问机会的持续增长,甚至连大学教授收入水平的持续上涨(尤其是外部兼职劳务费用的上涨)都可以作为学者们在新时代学术自信心上升的证据性指标。

### 3. 技术和其他支持条件的约束(或促进)

我们识别出来的第三个维度,暂且将其命名为“技术和其他支持条件的约束(或促进)”。这个维度本身是否具有理论中心性,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此处将其纳入,主要是从笔者(第一作者)自己的经验来看,也许它具有隐含的重要性。比如说,每一代社会学者在形成自己的社会学学力时,都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或者其他的支持性制度。举例来说,当年笔者(第一作者)学习 SPSS 统计软件的时候,该软件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学习者自行编制命令语句才能运行特定计算,且效率低下,既不像当今的 SPSS 版本那样实现了窗口化操作,也不像 Stata 软件那样高效且操作简便。其次,是外文文献的可获得性。当前来看,似乎连原版外文文献都已经不再是一书难求,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电子文献和 PDF 阅读器的配合。Web of Sciences、Elsevier、ProQuest 等全球期刊集成数据库的普及,也使得全球层面的文献检索工作变得更加容易。因此,仅就掌握全球普适的方法手段,以及熟知全球普遍的社会科学理论框架而言,对于每一个本土社会学者而言,上述技术条件作为制度性支撑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 三、当代本土化/国际化争论中的逻辑亮点

以上我们仅从旁观者的视角出发,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史上的历次本土化倡议的缘起做了分析,并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知识社会学框架,认为在各个时代的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特定部分产生的本土化运动的共识,至少受到了三重内外因素——外部学术力量卷入和中外学术地位的相对关系、学术共同体内部结构特征的转变和技术—制度条件的变化——的形塑和架构。但是,我们还需要回答以下这个问题,也即针对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争议,我们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当然,就我们前面所采取的知识社会学的框架这一点来看,我们关于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的立场一定是折衷主义的,即认为在特定的知识社会学情境下,如果本土化或国际化/全球化的倡议能够将一种本已失去均衡的关系再重新均衡化,那么对于学界而言,未尝不是一件乐见其成的事。特定地,我们还将通过对过往本土化争论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我们认为在逻辑上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几个要点进行简要阐述,来进一步抒发我们关于这一争论的立场。

### 1. 本体论信仰:人类文化实践的普适性

首先,在本体论意义上,我们更倾向于采取一种人类文化实践具有一定程度普适性的立场,并将这种立场看作深植于学者个体学术意识基底的一种类似信仰的认知依归。郭于华教授曾经这么发问“我们究竟有多么特殊?”<sup>①</sup>,尽管其本意是在针对“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这一对社会学史上具有重要意涵的二元对立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却也清楚地表达了其对人类文化实践中的普适性基础的认可。笔者(第一作者)的老师刘世定教授大概是这一立场的另一个主要支持者。在他看来,诸如关系(guanxi or connections)、面子(favor exchange)之类概念化处理所指涉的社会事实,其实在全世界的文化实践中普遍存在,只是程度差异而已。这是多年来我们在日常学术谈话中经常涉及的一个主题,即认定中国的社会文化实践应该从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实践,两者之间存在着连续性而非断裂。我们认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界的年轻一代学者而言,采取这样一种本体论立场应该是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学和世界的社会学才能保持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和连贯

<sup>①</sup>郭于华《我们究竟有多么特殊》,《社会学家茶座》2012年第4期。

性;与此同时,这样一种立场也是中国社会学界专业化程度稳步上升、学术自信心逐渐高涨的一个符号标记。

## 2. 方法论视野:理论抽象程度

王宁教授在2017年发表的、阐述自己关于社会学本土化观点的重要论文<sup>①</sup>中,对持普遍主义立场的学者们的意见做了很好的巡礼。笔者猜想他本人的意见和笔者的意见相当接近,也即需要考虑到学者个人的学力对于他的论战立场的潜在影响。因此,他先后提出专业能力不足和学术创新能力不足这两个学力因素来解释过度国际化和过度本土化这两种非均衡状态。在这篇文章中,更加吸引笔者注意力的是他关于彭玉生教授的论战立场的剖析:对于那些过于强调中国社会的“情境嵌入性”的学者来说,理论抽象程度的不足,的确可以造成“中国特殊论”的过度膨胀。这个想法,其实是笔者一直以来所持有的观点,也即理论概念的层次,从构建概念(construct)出发,一直到操作化定义(operationalized definition),实际上中间有很从容的一个概念降级或上升的空间。沿用彭玉生教授的话来说:

“许多做质性研究的学者避而不谈操作化,好像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实际上,这恰恰是概念化与操作化的一些最基本原则被忽略的地方。定性研究者经常混淆变量概念及取值概念(value concepts),因为定性研究经常研究少量案例并且重视的是每个案例的独特性。因此,一些定性研究者专注于变量的取值,却忽视了抽象的变量。我们常听人说,中国如此特殊以至于西方的理论概念不适用。这话本身没错,但大多数情况是变量本身与中国直接相关,只是取值独特。比如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人际关系模式描述为‘差序格局’,西方是‘团体格局’。这里的变量概念是人际关系模式,而‘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只是这个概念的两个取值。再比如,中国的商业交易严重依赖人际关系和‘走后门’,这反映了正式制度的脆弱,而不是正式制度这一概念无用。其实,‘关系’操纵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只是方式、程度(取值)不同而已。”<sup>②</sup>

这段话十分形象地揭示了彭玉生教授自己心目中关于“中国特殊性”的理论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看法为我们评估中国“时空嵌入性”的理论意涵提供了基本思路。鉴于中国“时空嵌入性”不仅是从一个中立的立场评价本土化运动的知识社会学起点,同时也是评价一个均衡的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关系的方法论起点,因此我们还可以对这一关键概念的理论价值做进一步的说明。

## 3. 中国“时空嵌入性”的理论价值

在王宁教授所引的持普遍主义立场的学者中,陈映芳教授的立场最有助于说明中国“时空嵌入性”的理论价值。陈映芳教授以国家—社会关系这一普适理论框架和中国嵌入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例,说明这一架构与多样性本土实践的切合性:首先,1980年代以来世界的政治剧变——亚洲、拉美、中东等各地威权政府的民主转型、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转向、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市民社会在一些传统民主国家(如日本)的迅速兴起——造成了学术界对相关理论范式的迫切需要<sup>③</sup>;其次,文章中还转引了社会史专家朱英教授的说法为例,说明国家—社会关系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启示。具体来说,朱英教授在研究中国商会的过程中,分别采用了政治史、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和公共领域范式,直到最后采纳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用朱英教授的原话来说:“我感觉它似乎更有利于商会史及整个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应该说,

<sup>①</sup>王宁《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sup>②</sup>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sup>③</sup>陈映芳《今天我们怎样实践学术本土化——以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应用为例》,《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

‘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近代史甚至很多相关学科,包括古代史,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好多事情都是透过它去分析的”。

当然,除了如上所说的验证抽象理论框架的适切性这一价值之外,中国“时空嵌入性”的另一个理论价值,则是对西方抽象理论框架的证伪或扩展所作出的贡献,这也是很多持本土化立场的学者们所强调指出的。比如说,针对关于威权国家的某些看起来达成一致的理论假设,一些更加聚焦的经验研究分别指出了这些理论假设所未能加以包容或合理解释的中国情境:如基层治理中“灵活的威权主义”概念的提出<sup>①</sup>;或者对中国立法进程中的独特民意过程的关注和强调<sup>②</sup>。这一类表征中国嵌入性之独特理论价值的、理论取向的经验研究的积累和扩展,实际上将成为联结中国社会科学和国际社会科学的重要桥梁,也是两者之间表现出均衡关系的一个良好证据。

## 结语

至此,我们已经明确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即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演进的宏大脉络中,本土化和全球化/国际化之争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相关性,而毋宁说其表征的是学者们在各自学力养成基础上的一个“价值有涉”的立场和偏好而已。比如说,定量研究者似乎更偏向于全球化/国际化,他们的文献回顾也更多地表现出对世界范围内稳定发生和呈现的定量模式(quantitative patterns)的关注;而定性研究者则很可能因为与在地特殊性(local specificity)的频繁亲密接触,而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本土化立场的更多坚持。有时候,有限范围内的方法竞争和方法争论,也许会扩展开来演变成一场围绕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的激烈争论。因此,对于认为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在逻辑层面并无根本性差异的笔者来说,呼吁一个更加均衡的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关系,也许就成了看起来颇具折衷主义的一个主观选择:无论是在研究议题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一个兼容并包的学术原则将或者调和持不同立场者间的争端,或者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走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责任编辑:萧景 jdxbshehui@163.com]

---

<sup>①</sup>Lee, Ching Kwan,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3 (6): 1475 – 1508.

<sup>②</sup>Truex, Rory. “Authoritarian Gridlock? Understanding Delay in the Chinese Legislative Syste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8 (1): 1 – 38.

## Abstract

### More Discussion on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as Academic Activity

LIU Neng, WU Su

This thesis divides the history of China's sociology into four periods: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periods from 1895 to 1920, early development period from 1921 to 1952, renaissance period from 1979 to 1998 and conventionalization period from 1999 to 2018. Besides, the thesis also analyzes the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 of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participation of external academic factors, internal change of academic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and restriction or promotion of other support systems are three core elements which constitute sociology knowledge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popularity and manifestation of sociology indigenization issues. This thesis also illustrates typical opinions in controversy of modern sociology indigenization, intern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We think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ology, the controversy about indigenization, intern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is not relevant when it comes to ontology. It is just scholars' preference based on their own academic attainments. Therefore, taking absorbing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as principle of research subjects or research methods may reconcile controversy and promote research of China's sociology to realize new academic achievements.

### Introduction, Construction and Imagination of Sociology Indigenization

HUANG Xiaoxing

Controversy about sociology indigenization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since more than 30 years restoration of China's sociology. Controversy issu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re emphasis in the process of sociology profess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From shift of research subjects, local sociology construction to improvement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different part of specialized subject construction causes indigenization controversy about research subject, theory universality and methodology. China's sociology indigenization is a process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ociology theories to construction of local academic community. Introduction in and out are two sides of indigenization. Question faced by sociology is understanding to the deep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This is fundamental issue need response of indigenization at this stage.

### Indigenization of China's Social Work: Politics, Culture and Practice

HE Xuesong, YANG Chao

In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al work, indigenization has been the core issu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China's social work. Political connection, cultural sensation and practice introspection are three factors of China's social work Indigenization. The contex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work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western countries. This essay aims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practice factors justify indigenization of China's social work.

### Magic of Social Research: Centered with Fei Xiaotong

TIAN Yipeng

Sociology as subject is imported goods. Howev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many sociologists including Fei Xiaotong advocated sociology indigenization to understand western sociology and solve China's social problems. Fei Xiaotong expla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from differential pattern, religion, imperial power and gentle power. His research on small town carved out special way about urbanization different with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Every subject has its own pedigree created great master. This pedigree is priceless treasure for every later scholar. Through research on Fei Xiaotong's discover China trip, we can find out special magic of social studies.